

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 爭取真正有教無類

「玫瑰，不管換個什麼名字，還是一樣的芬芳；人類，不論有着什麼顏色，應有一樣的尊重。」王惠芬的名片背後印有這句話。

3月17日，尼泊爾裔香港居民在何文田被警員開槍擊斃，3月下旬，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忙着為死者家人四出奔走，既諮詢法律意見，又遊行示威。10多年來「馴身」服務港人「只認色、不認識」的少數族裔，無懼死亡恐嚇，為他們爭取公平對待。她的堅持為着把香港教育制度「撥亂反正」，體現真正的「有教無類」。

文：關詠賢圖：劉煥陶、受訪者提供

嘉賓主持

張超雄（左）

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

科學系講師，前立法會議員（社會福利界）。任內4年主力為本港弱勢社群、婦女等爭取應有權益，尤其關心傷殘人士，2009年初成為關注本港弱勢社群組織「關懷香港」召集人，人稱「鬚鬚俠」；育有3名子女，大女盈盈患有嚴重智障。

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

王惠芬（Fermi，右）註冊社工，於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。

2001年成立一人組織香港融樂會，首3年當全職義工，偶而靠家人的經濟支持。

2005年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，2006年重投總幹事崗位後正式支薪，職員由一變六，2008年7月調任倡議總監至今。

港人「認色、不認識」

「玫瑰，不管換個什麼名字，還是一樣的芬芳；人類，不論有着什麼顏色，應有一樣的尊重。」王惠芬的名片背後印有這句話，且中英對照，簡潔的文字道出「公平」的意思，也是她「馴身」幫助本港少數族裔的原因——彰顯社會的公平與公義。

張超雄卻滿腹疑問：「你並非少數族裔，身為純正的中國人，幫助本港少數族裔的那團火從何而來？」她說自己的想法簡單，投身社會後看到弱勢一群受到較差的待遇，「不論在什麼顏色的皮膚下，血也是紅色的，受到的待遇不應是公平的嗎？」但，香港人似乎「認色、不認識」。

「中國人應服務中國人」

11年前，王惠芬剛投身社會，在深水埗區做青少年外展工作，首次遇上南亞裔孩子，「那些孩子在李鄭屋官立小學念下午校，返學前想到球場踢球給趕走，想到社區中心玩又不予進入」。

她當時的同事說：「中國人應服務中國人」。於是王惠芬每天在午飯時間，把乒乓球檯推到中心外的空地跟他們打球，更多南亞裔孩子聞風而至。

有孩子不明白為何自己和朋友不能進入中心玩耍。王向上級請示，回覆是「人手、資源等等還沒預備好為這些孩子提供服務」。她如實告訴孩子，孩子的反應是「But I see Chinese goin, why I can't? (我看見中國人進去，為何我不能?)」一句話警醒了王惠芬，明白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她轉職到油麻地社區中心。

那時她遇上更多南亞裔家庭，更多在公園流連的失學孩子。「人人都知道本港自1978年開始實施9年免費教育，教育在香港應該是唾手可得的。」王惠芬說10年前只有兩間中學、兩間小學為少數族裔孩子提供學位，在學位不足下，6至15歲的孩子即使持香港身分證，卻往往要等3年才能入學。「『教育作為合法手段改變命運』一說法，似乎不能應用在這群孩子身上。」常為少數族裔孩子張羅學位的王感嘆。

爭取入學變「人球」

王惠芬忘不了10多年前的個案。她結識了14歲、小三學歷的巴基斯坦裔男孩，很想讀書的他來港3年都未能通過入學試。二人在提供學位的四間中、小學、教育署（現教育局）油尖辦事處和教育署總部折騰年多，卻回到「向學校查詢」的起點。

王惠芬去信教育署反映，回覆是「孩子年過15歲，在政策上我們不能幫到他」，她心想「你們根本沒有幫過他」，再向主流學校查詢，回應是「我們過去、現在、將來也不會有學位取錄這類孩子」，王感到學校未免太過狠心，未及體現「有教無類」已「關上後門」。男孩後來找到月入3千多元的送外賣工作，4年後回鄉翌日被車輾斃。「這男孩在香港度過11到19歲，8年來我們卻沒有關懷他。」

」王執意認為要是男孩有書讀，命運或會不一樣。

在2004至06年間，王惠芬曾到澳洲當伴讀，當時小四、小五的外甥女獲當地校方安排學位導師免費補習英文，又主動助她們融入學習，澳洲對協助少數族裔在適應學習的層面上，與她曾接觸的個案對比甚大，這經歷都令王惠芬狐疑為何別國可以惟香港不。想起香港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涼薄，她決心更盡力幫助這群孩子尋找讀書機會。

「同學、不同樂」

「我們不是說『有教無類』嗎？這不過是個empty slogan（空談）。」王惠芬對「分類教育」有感而發。10年後，取錄少數族裔學生的中小數目增加，學位問題解決，接下來要處理教學質素。

「同學、不同樂」，王說學校未能在課堂上全面照顧少數族裔孩子的學習需要，例如校方需要為他們額外度身訂做一套適用於整個中、小學課程的教材，王張二人明白在實行上並不容易，結果少數族裔在班房裏依舊是少數，孩子在班上「坐」，王惠芬說他們雖然不會不快樂，但也不可能有成功感。

「現在華人社會畀書你讀，你讀成咁？」責難隨之而來，但問題根源在於香港教育欠缺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」學科讓他們掌握學習語言，主流語言學不好，如何投入課堂？

王惠芬（右）曾因自製的名片粗糙被誤會招搖撞騙；試過未能為被捕的少數族裔青年付500元保釋金被警員取笑，經常自掏腰包服務少數族裔的她，生活捉襟見肘也沒時間休息，但臉上總掛着燦爛笑容。

曾有巴基斯坦裔中五男生被趕離校後向王查詢基督教正生書院，「我告訴他正生是幫助年輕人戒毒的地方」。男生後來藏毒被捕，「我問他原因，他說『是你說入正生要吸毒才成』。」圖為王惠芬（後排左五）與該校學生合照，她欣慰地說：「他們都畢業了，都是好人。」前排右為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。

王惠芬為南亞裔孩子舉辦補習班，又與他們一起搵學校。她跟友人說起本港少數族裔孩子的故事，友人大都難以置信，更會反問：「你係咪作嘢？」

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 爭取真正有教無類

08 教得樂 有緣相聚



3月17日，尼泊爾裔香港居民在何文田被警員開槍擊斃，3月下旬，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忙着為死者家人四出奔走，既諮詢法律意見，又遊行示威。10多年來「腳身」服務港人「只認色、不認識」的少數族裔，無懼死亡恐嚇，為他們爭取公平對待。她的堅持為着把香港教育制度「撥亂反正」，體現真正的「有教無類」。

文：關詠賢 圖：劉焯陶、受訪者提供

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

爭取真正有教無類

嘉賓主持 張超雄（左）

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，前立法會議員（社會福利界）。任內4年主力為本港弱勢社群、婦女等爭取應有權益，尤其關心傷殘人士，2009年初成為關注本港弱勢社群組織「關懷香港」召集人，人稱「鬚鬚俠」；育有3名子女，大女盈盈患有嚴重智障。

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 王惠芬(Fermi, 右)

註冊社工，於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。2001年成立一人組織香港融樂會，首3年當全職義工，偶而靠家人的經濟支持。2005年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，2006年重投總幹事崗位後正式支薪，職員由一變六，2008年7月調任倡議總監至今。



王惠芬（右）曾因自製的名片粗糙被誤會招搖撞騙；試過未能為被捕的少數族裔青年付500元保釋金被警員取笑，經常自掏腰包服務少數族裔的她，生活捉襟見肘也沒時間休息，但臉上總掛着燦爛笑容。



“

「玫瑰，不管換個什麼名字，還是一樣的芬芳；人類，不論有着什麼顏色，應有一樣的尊重。」王惠芬的名片背後印有這句話。

”

港人「認色、不認識」

「玫瑰，不管換個什麼名字，還是一樣的芬芳；人類，不論有着什麼顏色，應有一樣的尊重。」王惠芬的名片背後印有這句話，且中英對照，簡潔的文字道出「公平」的意思，也是她「翻身」幫助本港少數族裔的原因——彰顯社會的公平與公義。

張超雄卻滿腹疑問：「你並非少數族裔，身為純正的中國人，幫助本港少數族裔的那團火從何而來？」她說自己的想法簡單，投身社會後看到弱勢一群受到較差的待遇，「不論在什麼顏色的皮膚下，血也是紅色的，受到的待遇不應是公平的嗎？」但，香港人似乎「認色、不認識」。

「中國人應服務中國人」

11年前，王惠芬剛投身社會，在深水埗區做青少年外展工作，首次遇上南亞裔孩子，「那些孩子在李鄭屋官立小學念下午校，返學前想到球場踢球給趕走，想到社區中心玩又不予進入」。她當時的同事說：「中國人應服務中國人」。於是王惠芬每天在午飯時間，把乒乓球檯推到中心外的空地跟他們打球，更多南亞裔孩子聞風而至。

有孩子不明白為何自己和朋友不能進入中心玩耍。王向上級請示，回覆是「人手、資源等等還沒預備好為這些孩子提供服務」。她如實告訴孩子，孩子的反應是「But I see Chinese go in, why I can't? (我看見中國人進去，為何我不能?)」一句話警醒了王惠芬，明白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她轉職到油麻地社區中心。

那時她遇上更多南亞裔家庭，更多在公園流連的失學孩子。「人人都知道本港自1978年開始實施9年免費教育，教育在香港應該是唾手可得的。」王惠芬說10年前只有兩間中學、兩間小學為少數族裔孩子提供學位，在學位不足下，6至15歲的孩子即使持香港身分證，卻往往要等3年才能入學。「『教育作為合法手段改變命運』一說法，似乎不能應用在這群孩子身上。」常為少數族裔孩子張羅學位的王感嘆。



曾有巴基斯坦裔中五男生被趕離校後向王查詢基督教正生書院，「我告訴他正生是幫助年輕人戒毒的地方」。男生後來藏毒被捕，「我問他原因，他說『是你說入正生要吸毒才成』」。圖為王惠芬（後排左五）與該校學生合照，她欣慰地說：「他們都畢業了，都是好人。」前排右為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。



王惠芬為南亞裔孩子舉辦補習班，又與他們一起搵學校。她跟友人說起本港少數族裔孩子的故事，友人大都難以置信，更會反問：「你係咪作嘢？」

爭取入學變「人球」

王惠芬忘不了10多年前的個案。她結識了14歲、小三學歷的巴基斯坦裔男孩，很想讀書的他來港3年都未能通過入學試。二人在提供學位的四間中、小學、教育署（現教育局）油尖辦事處和教育署總部折騰年多，卻回到「向學校查詢」的起點。王惠芬去信教育署反映，回覆是「孩子年過15歲，在政策上我們不能幫到他」，她心想「你們根本沒有幫過他」，再向主流學校查詢，回應是「我們過去、現在、將來也不會有學位錄取這類孩子」，王感到學校未免太過狠心，未及體現「有教無類」已「關上後門」。男孩後來找到月入3千多元的送外賣工作，4年後回鄉翌日被車碾斃。「這男孩在香港度過11到19歲，8年來我們卻沒有關懷他。」王執意認為要是男孩有書讀，命運或會不一樣。

在2004至06年間，王惠芬曾到澳洲當伴讀，當時小四、小五的外甥女獲當地校方安排學位導師免費補習英文，又主動助她們融入學習，澳洲對協助少數族裔在適應學習的層面上，與她會接觸的個案對比甚大，這經歷都令王惠芬狐疑為何別國可以惟香港不。想起香港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涼薄，她決心更盡力幫助這群孩子尋找讀書機會。

「同學、不同樂」

「我們不是說『有教無類』嗎？這不過是個empty slogan (空談)。」王惠芬對「分類教育」有感而發。10年後，取錄少數族裔學生的中小數目增加，學位問題解決，接下來要處理教學質素。「同學、不同樂」，王說學校未能在課堂上全面照顧少數族裔孩子的學習需要，例如校方需要為他們額外度身訂做一套適用於整個中、小學課程的教材，王張二人明白在實行上並不容易，結果少數族裔在班房裏依舊是少數，孩子在班上「坐」，王惠芬說他們雖然不會不快樂，但也不可能有成功感。「現在華人社會畀書你讀，你讀成咩？」責難隨之而來，但問題根源在於香港教育欠缺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」學科讓他們掌握學習語言，主流語言學不好，如何投入課堂？